

引用:谭雨萌,胡逸蝶.中医东渐的文学向度:中医传日与江户文人的关联性研究[J].中医药导报,2025,31(3):1-4,23.

海外中医

中医东渐的文学向度*

——中医传日与江户文人的关联性研究

谭雨萌^{1,2}, 胡逸蝶²

(1.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2.湖北中医药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5)

[摘要] 日本江户时代是中医传日的繁盛时期之一,以中医学为内核的汉方医学在江户时期得以确立和发展。其间,除了中日医师间的交流外,文人作家群体的医学创作活动同样值得关注。在医儒相通的时代背景下,随着航海业和印刷业的进步,中日两国的医学交流蓬勃发展。江户文人多能汉文直读,且医儒兼修,他们翻译注释典籍、推广中药本草、重视医学伦理、周游日本讲解中医哲学原理,还创作出一批富有中医药文化特色的文学作品,促进了日本社会对中医药的理解、吸收和传播,其著述也是研究中医药发展和传播的重要史料。

[关键词] 中医药国际传播;江户文人;涉医文学;汉方医学;医儒兼修;日本江户时代

[中图分类号] R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51X(2025)03-0001-04

DOI:10.13862/j.cn43-1446/r.2025.03.001

The Literary Dimension of the Sprea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Japan: A Study on the Relevance between the Dissem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Japan and Literati in Edo Period

TAN Yumeng^{1,2}, HU Yidie²

(1.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China;

2.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be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Wuhan Hubei 430065, China)

[Abstract] The Edo period in Japan was one of the most prosperous periods for the transmiss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in Japan, when Kampo medicine, which is derived from TCM, was established and developed. During this period, in addition to the exchange of medical knowledge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doctors, activities of the literati are also noteworthy. In an era where medicine and Confucianism were interconnected, with advancements in navigation and printing, medic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were further promoted and strengthened. Most Edo literati were proficient in reading classical Chinese, well-versed in both medicine and Confucianism. They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Chinese classics, promoted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emphasized medical ethics, traveled throughout Japan explaining the principles of TCM Philosophy, and created a number of literary works with distinct features of TCM culture. This contributed to Japan's understanding, absorp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CM, and their literary works are important historical materials for studying the development and dissemination of TCM.

[Keyword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TCM; Edo literati; medical literature; Kampo medicine; well-versed in both medicine and Confucianism; Edo period in Japan

医学与文学之间自古就有着密切的联系,许多古代文人兼任医者或精通养生之道。儒者若通黄素,明诊疗,施于疾,则可谓之儒医。医儒兼修的古代文人常从医学中汲取灵感和

启示,创作出了众多优秀的涉医文学作品,如“苏轼养生诗歌中,常在对物象的描摹与歌咏中融入身世之感,以物自喻,又传达出超然物外的高雅意趣”^[1],又如陆游精通医学,杂谈诗

*基金项目:2021年度湖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计划资助项目(B2021113);2022年湖北中医药大学青苗计划(2022ZZXQ017)

歌中也多有愈疾、种药和采药相关内容。这些作品不仅丰富了文学的内涵,也为后人提供了珍贵的医学知识和文化遗产。

日本江户时代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繁荣时期之一,也是中医传入日本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江户文人对包括中医典籍在内的各类汉文书籍进行了大规模的学习和模仿,其中不乏与中医药文化和中医药思想相关的文学创作,对中医药在日本的发展和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笔者尝试以日本江户时代有医学背景的文人及其作品为研究对象,主要通过已有材料的整理和分析,梳理江户文人和江户涉医文学在中医传日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发掘江户文人作为中医药传播媒介的价值。由于“文人”一词在不同历史、文化和学术背景下的定义有所差异,笔者主要从加藤周一《日本文学史序说》收录的人物中选取研究对象,进一步明确江户文人与中医药在日本传播的关联性。

1 中医药在日本江户时代的传播环境

关于中日医学交流的历史脉络,已有学者进行了深入研究^[2]。“日本的汉方医学受惠于中国甚多,到十六世纪为止,基本上是中国对日本单方向的传入”^[3]。明末清初正值江户时代初期,由于清政府的“闭关”和德川幕府的“锁国”政策,直至江户时代结束,中日两国都没有正式的邦交关系。但整个江户时期,“两国之间民间的来往和通商贸易仍很频繁并不断增长”^{[2]78},医学交流作为文化交流的一部分,“无论在频数、层次、质量等方面都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2]80}。第一,政府的文治方针为中医药的传播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德川幕府重视医学发展,“经由长崎贸易渠道购入中国中医药书籍,招募中国民间医师,购入中药药种和药苗”^[4],委托商人自中国招聘良医,传授医术。第二,航海技术的进步促进了中日之间的贸易往来,药材、药品、医书和医师也搭乘商船往来于中日之间,交流日益频繁。包括中医典籍在内的汉籍流入江户,“其品种和数量都很可观”^{[2]80}。第三,江户时代的出版业发展迅速,浮世绘的盛行造就了成熟的“合作、出版与传播的生产网络”^[5],江户“五街道”的畅通和“飞脚”职业的兴起促进了信息情报的流通^[6]。第四,江户时代以前,日本对中国文化已有持续千年的吸收和承袭,江户文人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厚的崇拜之情,他们大多能熟练阅读和书写中文,为中医药文化在江户时代的吸收和本土化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为中医药的广泛传播培育了肥沃土壤。

在上述优良的中医药传播环境中,“很多儒学者同时也悬壶治病,医师也同时精研儒学”^[7],引发了“儒医一本”的社会风潮。与我国宋代兴起的儒医群体相似,江户文人、作家在从事医学实践活动的同时也创作了诸多医药相关著述和涉医文学作品,推动了中医学在日本的传播,进而影响了汉方医学的形成和发展。

2 江户文人与中医哲学智慧

中医学是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中医学,作为一种生命哲学,蕴含了独特的宇宙观和自然观。其中阴阳、五行、“气”等对生命本质和规律的理解在日本江户时期广为人知,也成为日本学者发展本土学问的源泉和基础。

2.1 获生徂徕与经方推广 有学者曾指出,江户时代的主导思想是阳明学左派、日本阳明学及其变种的古学派和徂徕学派^[8]。其中徂徕学派的创始人获生徂徕是日本儒学的重要代表之一,他“‘景慕华风’,以‘日本国夷人’而自居,感慨‘东海不出圣人’”^[9]。获生徂徕博学嗜古,著书等身,他在近世儒学、汉学、文献学和政治学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掩盖了其对医学发展的巨大贡献。获生徂徕出生于医学世家,父亲具有曲直瀨道三学统^[10],曾任德川纲吉将军的侍医,祖父是乡镇医生^{[11]19}。获生徂徕虽未以医家为业,但仍然博览医书,毕生所学所思也与医学紧密相连。后人将其医学相关的评论整理成书,如《徂徕先生医言》和《徂徕先生素问评》等,书中包括了获生徂徕对其他近世学者医学著作的批评,也有自己关于儒学和中医的思考。获生徂徕主张六经皆史,提倡汉文直读,从广阔的学术视野对政治、经济、庶民、历史、法制、语言诗文等方面潜心研究,确立了具有独创性的“徂徕学”,为江户儒学贡献了新的研究范式,也是本居宣长(1730—1801年)实证主义文献学的基础^{[11]20}。获生徂徕尊重历史,讲究考证,虽热爱汉学,但并不赞同阴阳五行学说。这些观点直接影响了古方派大家吉益东洞。吉益东洞由此极力推崇重视实践的仲景学说,尤其是《伤寒论》。排斥诸家,虽有偏颇,但吉益东洞推广了经方的运用,扩大了经方的影响,促进了日本汉方古方学派的发展,“对古方派乃至整个日本汉方医的发展皆起到积极作用”^{[12]168}。

2.2 安藤昌益与阴阳五行学说 思想家安藤昌益也是儒医出身,曾游历各地,从事过不同种类的医学活动。安藤昌益出生在日本东北的秋田县,在那里受到一位古方学派儒医的启蒙,又先后到京都、大阪和东京从事医学和教育活动。在京都学习期间医学思想开始向以李朱医学为主体的“后世派”倾斜。壮年时期再次回到青森县开设医馆,同时进行思想研究。安藤昌益是日本反封建思想的先驱者,曾对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儒、佛、神、老、庄”等思想进行了全面而激烈的批判^[12]。实际上他的思想却和中国古代医学和哲学思想有着内在联系。有学者评价他的哲学思想大致继承了王充、张载的唯物主义传统,医学观基本主张与中国传统医学的“治未病”思想基本一致,自然观也是以中医、本草学中的阴阳五行的“气”说为基础的^[13]。阴阳五行理思想中所蕴含的变化循环理念,在江户中期以后的农业思想中得以普及和本土化,“安藤昌益在《周易》的影响下著有代表作《统道真传》,基于气一元论和阴阳五行说,论证自然无始无终、无差别,人与天地合一”^[14]。在不同学派的影响下,安藤昌益积累了丰富的医学和本草学知识,而后从中跳出,从更广阔的视角建立了自己独特的知识体系,除了医学之外,还对生态学、和平反战思想和平等思想等诸多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2.3 三浦梅园与“气”学说 自然哲学家三浦梅园出生于日本九州,父亲和祖父都是医生。三浦梅园继承了医业,在坚持行医的同时开设私塾培养弟子^[15]。三浦梅园的教育主要是儒家的传统教养,学习中国古代文献和宋学,后来又结合从西方的天文、地理、医学那里学来的实证方法,形成了独特的自然哲学体系。三浦梅园的医学论著主要包括《赘语》身生帖、《造物余谭》及《身生余谭》,也写过和贝原益轩著作同名的

《养生训》,医学著作中主要引用的是后藤椿庵、香川修庵、山胁东洋等古方派医家的实证主义观点。哲学代表作有《玄语》《赘语》《敢语》,被称为“梅园三语”。三浦梅园的哲学思想“是在深受中国儒学(包括日本朱子学派和古学派)影响的基础上,又受到西洋天文学和中西医学(从《黄帝内经》到《解体新书》)的影响形成的”^[16],主要包括一气论和天命观等。三浦梅园认为“气”是天地万物之本,时间、空间和五行皆为“气”的属性,“气”与“物”既相反又统一,一气通塞,天地活立。“所谓活指与死相对的生、灵活、活动”^[16],“活”与“死”、“气”与“物”相互转化,与中医气运学说类似,如同太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富含阴阳思维的辩证之法。三浦梅园独特哲学思想的普及也让“气”这一最具中国色彩的哲学语言在日本医学及其他领域得到了更广泛的运用。

3 江户文人与中药学

在江户时代以前,日本本草学主体是“亦步亦趋学习中国本草学”^{[21]28},输入所需药物的同时亦注重对本土药材的综合研究。江户初期《本草纲目》的传入彻底颠覆了日本本草学研究的原有格局,开启了日本本草学发展的鼎盛时期。

3.1 贝原益轩与《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最早由京都儒学家林罗山献给德川家康,“德川家康置之左右,以示珍重”^{[21]29}。贝原益轩参照《本草纲目》,采用相同的分类方法撰成《大和本草》,保留了《本草纲目》里中日共有的草本植被,记录了超过1300种草木的形状、效用等,成为了日本博物志方面划时代的著作^{[11]10}。(见图1~2)



图1 日语注解《本草纲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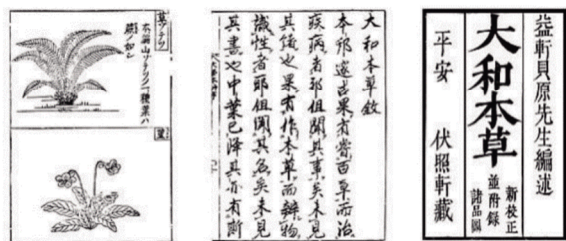


图2 《大和本草》

贝原益轩被誉为日本的亚里士多德,是日本著名的哲学家和医学家,曾作为儒者江户黑田蕃(今大阪中之岛)为官,“自小从兄长处学习素读,后来学习中医和宋明理学”^{[11]10},成为了近世时期在朱子学、药理学、博物学等领域均颇有建树的大儒^[17]。其著作大致分为4类^{[11]10}:其一,博物学、医药卫生类的著作;其二,有关朱子学的注解和理论著作;其三,宗谱和地方志;其四,旅行记。贝原益轩原晚年时期根据毕生所学著

成的《养生训》以儒家伦理为基础,包罗了和汉文化、儒医学问在内的丰富知识,不仅仅是作为医书,同样也是作为一般的启蒙书籍被广泛接受^[19]。贝原益轩的养生著作不仅在日本家喻户晓,还“被多次外译,逐渐流向欧美,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医养生思想在海外的传播”^[20]。

3.2 平贺源内与《山海经》江户时代的全才平贺源内与中药学的关系同样值得关注。“他是日本江户时代中期有名的本草学家、地质学家、兰学家、医生、发明家、陶艺家、画家,堪称‘全才’,后专心从事通俗小说的创作,成为江户时代戏作文学的鼻祖”^[21]。平贺源内13岁时开始学习儒学和本草学,曾到长崎学习兰学,后到江户成为医师、本草学家田村蓝水的弟子。平贺源内曾多次作为主办人举办“药品会”和“物产会”等类似于现代博览会的活动,还著有博物学、本草类启蒙书《物类品隲》、滑稽小说《风流志道轩传》和《根无草后编》等。《风流志道轩传》和《根无草后编》两部作品中均有《山海经》的相关内容。“《山海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区域地理著作,记载了大量先秦时期与医学有关的药物、疾病、病症及其防治的珍稀资料”^[22],反映了中医学早期的形态和特征,也被后世医家广泛传播和吸收,具有极高的应用和参考价值。平贺源内的作品让《山海经》以日本文学的形式渗透到江户社会,也通过《山海经》在日本巨大的影响力进一步推动了中医药文化的接受和传播。

4 江户文人与中医良方

除了平贺源内之外,还有多位江户时代的作家有过从医经历,其作品也深受中医药文化影响。例如日本读本小说的鼻祖都贺庭钟父子,都贺庭钟的弟子、江户文学大家上田秋成,国学家、思想家本居宣长,以及江户后期最著名的小说家曲亭马琴等都是医儒兼修的典范。他们熟读中医经典,深谙典籍中的异案良方,并将其融入创作中,留下了一批富有中医药特色的文学著作。

4.1 本居宣长与方剂歌诀 本居宣长曾在京都进行了为期5年半的学医之旅,学成后主要作为儿科医师从事医学活动。在勤学苦读钻研古典文学和国学的紧张生活下,医学活动也从未间断。本居宣长著有医学笔记《折肱录》《方剂歌》《济世录》《方彙简卷》《诸疾目録回春病门次第》等,还有一篇名为《送藤文與还肥序》的医论^[23]。其中《济世录》是从29岁到晚年期间持续记录的诊疗、用药和药价相关情况,《折肱录》和《方剂歌》是关于中医方剂学的学习记录。本居宣长在《折肱录》中以其独创的简化形式记录了《伤寒论》和《金匱要略》等中医典籍中的经典良方。《方剂歌》将中医方剂歌诀改写成了日本和歌的形式。例如《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所记载的“参苏饮”歌诀为:“参苏饮内用陈皮,枳壳前胡半夏齐;干葛木香甘桔茯,气虚外感最相宜。”本居宣长《方剂歌》中所记载的歌诀是:“参蘇飲(じんそいん),二陳葛根(にじんかつこん),桔梗しそ(ききょうしそ),人參前胡(にんじんぜんこ),きこく木香(きこくもっこう)。”^[24]

本居宣长的版本用“二陈汤”替换了原有歌诀中的半夏、陈皮、白茯苓、甘草几味药材,还将原有的七言歌诀改写成了日本短歌5-7-5-7-7的格式,兼具日本文学特征和中医药文

化内涵。但改写之后的歌诀未能保留对药效特点的描述,略显遗憾。

4.2 曲亭马琴与涉医小说 近世后期的儒医作家曲亭马琴也曾进行过涉医文学的创作。他曾将《水浒传》与《三国演义》《西游记》《搜神记》《山海经》等故事融合,著成了江户时期最具代表性的长篇小说《南总里见八犬传》。《南总里见八犬传》基本保留了《水浒传》中“英雄集结”的模式,在打斗场面的描写中常伴有治病疗伤的情节。例如第三十六回中提到了将生螃蟹捣碎外敷以解漆毒的方法。此方法在我国中医典籍中有各处记载。《本草纲目》介部第四十五卷详细介绍了蟹的药用功能,并整理了历代多位名医的观点,如:陶弘景“化漆为水,服之长生”,寇宗奭“解鳝鱼毒、漆毒”。还引用了《夷坚志》中对“漆之畏蟹”的描述:“襄阳一盗,被生漆涂两目,发配不能睹物。有村叟令寻石蟹,捣之滤汁点,则漆随汁出而疮愈也,用之果明如初”^[29],与《八犬传》中的情节颇为类似。

曲亭马琴将中医良方融入了文学创作之中,既增加了小说的趣味性和可信度,又很好地普及了中医药文化知识。小说中还有其他包括求仙、用药、阴阳术在内的情节,也反映出中医药文化在江户时代已达到了一定的传播广度。《南总里见八犬传》不仅在江户时期风靡一时,至今仍影响甚远。颇受大众喜爱的漫画《七龙珠》和《犬夜叉》都以其为原型,其中的中医药文化也在各个时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传播。

4.3 都贺庭钟和上田秋成 都贺庭钟曾对汉译版《佛说奈女耆婆经》进行本土化的改编。日语版本名为《通俗医王耆婆传》,将记录印度名医耆婆生平的佛经扩展成了共五卷十回的小说。小说借用了我国白话小说中的部分情节,描述了中医面诊、脉诊、问诊等情节,并详细分析了病因和治疗方案,多次使用“气血”“脏衰”“伤寒”“杂病”等中医相关术语,弱化了耆婆的佛教属性,反而使之具有了中医药文化特征和中国传奇色彩。上田秋成曾在晚年随笔集《胆大小心录》中回顾了行医生涯和难忘的诊疗经历。书名来自药王孙思邈的名言“胆欲大而心欲细,志欲圆而行欲方”,表明了自己行医和为人的准则。他还在文中描述了晚年弊衣薄食的生活,体现了其对饮食有节、顺应自然等中医养生理念的推崇。

以上文学家和文学作品作为中医药知识的载体,在江户时期传播广泛,对当时的学者和普通民众影响深远,随着文学经典流传至今,影响力仍不容小觑。

5 结 语

中医学不仅仅是作为治病救人的医学技术在日本江户时代被广泛学习和应用,还作为学习方法、哲学基础和创作素材,渗透到了江户学界的各个方面。江户时期的俳句诗人,同为儒医的胜部青鱼曾在改编作品《剪灯随笔》中谈到,以伊藤仁斋和荻生徂徕等为代表的古学(否定宋明理学,强调回到孔孟时代)在江户初期盛行。复古之风逐渐影响到医师群体,医学界开始以《伤寒论》和《金匱要略》为尊,古方派医学随之日益强大。文学界则是纷纷重拾万叶集等日本传统国学研究。因此有文人认为江户时期的文化按照“汉学的古学-医学-国学”这一路径传播,“可见医学融合文学,它们之间的相关性在那个时代是有脉络可循的”^[29]。笔者认为日本江户文人、

文学对中医药在日本的传播起到了媒介和推进作用。具体表现为:第一,江户文人通过民间交流的方式进行书籍和学术交流,促进了包括中医药知识在内的知识与文化融合;第二,江户文人多精通汉文,医儒兼修,通过译介、改编等方式将中医药典籍以通俗文学等形式再次呈现,对中医药文化、知识进行了广泛传播和细致阐释;第三,江户文人深受阴阳五行学说和气运学说等中医哲学的影响,并将中医思维融入了日本的哲学、医学、博物学和农学等诸多学科,拓展了中医学、中医药文化在日本的传播维度。

中医典籍作为江户医师的必修书目,在提供医学知识的同时也因其人文风貌和精神内涵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更多灵感。医学相关的文学作品由于江户出版、租赁业的发达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进一步扩大了中医药的影响力,也间接影响了日本汉方医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司聃.苏轼岭海养生诗研究[J].东岳论丛,2018,39(1):185-190.
- [2] 史世勤.中医传日史略[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 [3] 平马直树,王晓明.中医药学在日本的传承与发展[J].中医药导报,2019,25(5):1-5.
- [4] 仲光亮,李成杰.近世日本对中国中医药的受容[J].安徽史学,2018(3):111-116,137.
- [5] 彭宇,汪燕翎.博物馆视野中的日本工匠文化[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7(4):29-33,187.
- [6] 许益菲.江户的读书会[J].读书,2019(1):98-103.
- [7] 王京.明治时期的柳田国男与中国——从汉文典籍到怪谈、民间信仰[J].文化遗产,2021(5):91-99.
- [8] 岳远坤.上田秋成文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15.
- [9] 肖珊珊,吴光辉.文化自觉与文明陷阱:剖析现代日本知识分子的思想构造[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3):159-167.
- [10] 蓝弘岳.荻生徂徕の思想形成における医学と兵学:『徂徕先生医言』と『孫子国字解』を中心に[J].日本思想史学,2007,39:75-94.
- [11] 加藤周一.日本文学史序说[M].叶渭渠,唐月梅,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
- [12] 岩崎允胤.荻生徂徕と古文辞学[J].大阪経済法科大学論集,1996,65(8):1-41.
- [13] 王家骅.安藤昌益与儒学[J].日本研究,1992(4):50-56.
- [14] 宋全成,李庆亭.安藤昌益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日安藤昌益学术讨论会侧记[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4):116-118.
- [15] 周菲菲.论中国古代生态思想对日本传统生态理念及其循环型社会构建的影响[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8,34(11):92-97.
- [16] 近藤均.三浦梅園の医学体系の存立基(下转第23页)

- Organization, clinical and management indicators on the first year of activity of an outpatient clinic dedicated to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severe asthma in Italy[J]. *J Asthma Allergy*, 2021, 14: 1011–1018.
- [4] 李怡, 雷佳慧, 曲紫玥, 等. 过敏性哮喘的研究进展[J]. 中国临床医生杂志, 2022, 50(12): 1395–1398.
- [5] 任蕾, 张蓉芳, 那飞扬, 等. 生命早期抗菌药物暴露对儿童哮喘发病的影响[J]. 中国处方药, 2022, 20(12): 184–186.
- [6] CERETA A D, OLIVEIRA V R, COSTA I P, et al. Early life microbial exposure and immunity training effects on asthma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on[J]. *Front Med*, 2021, 8: 662262.
- [7] TANG H H F, TEO S M, SLY P D, et al. The intersect of genetics, environment, and microbiota in asthma—perspectives and challenges[J]. *J Allergy Clin Immunol*, 2021, 147(3): 781–793.
- [8] LIU H Y, LI C X, LIANG Z Y, et al. The interactions of airway bacterial and fungal communities in clinically stable asthma[J]. *Front Microbiol*, 2020, 11: 1647.
- [9] 林彦霞. 不同炎症表型的稳定期哮喘患者气道微生物组特征[D]. 广州: 南方医科大学, 2020.
- [10] TOIVONEN L, SCHUEZ-HAVUPALO L, KARPPINEN S, et al. Antibiotic treatments during infancy, changes in nasal microbiota, and asthma development: Population-based cohort study[J]. *Clin Infect Dis*, 2021, 72(9): 1546–1554.
- [11] HUANG C R, YU Y C, DU W, et al. Fungal and bacterial microbiome dysbiosis and imbalance of trans-Kingdom network in asthma[J]. *Clin Transl Allergy*, 2020, 10: 42.
- [12] 汪继胜. 多索茶碱和氨茶碱治疗支气管哮喘的效果和对患者肺功能的改善情况比较[J]. 临床合理用药, 2023, 16(5): 36–39.
- [13] 王刚祚, 徐江维. 脾氨肽联合匹多莫德辅助治疗儿童哮喘的疗效及其对干扰素调控因子1和信号转导转录活化因子-1表达的影响[J]. 儿科药学杂志, 2022, 28(9): 44–47.
- [14] 王思齐, 包凯帆, 王晓钰, 等. 抗生素呼吸道给药加重小鼠过敏性哮喘模型的建立[J]. 中国比较医学杂志, 2019, 29(8): 37–43.
- [15] HOU K J, WU Z X, CHEN X Y, et al. Microbiota in health and diseases[J]. *Signal Transduct Target Ther*, 2022, 7: 135.
- [16] ZHANG Y S, LIANG X J, BAO X F, et al. Toll-like receptor 4 (TLR4) inhibitors: Current research and prospective[J]. *Eur J Med Chem*, 2022, 235: 114291.
- [17] FITZGERALD K A, KAGAN J C. Toll-like receptors and the control of immunity[J]. *Cell*, 2020, 180(6): 1044–1066.
- [18] LUO W H, HU J D, XU W F, et al. Distinct spatial and temporal roles for Th1, Th2, and Th17 cells in asthma[J]. *Front Immunol*, 2022, 13: 974066.
- [19] LARSEN J M. The immune response to *Prevotella* bacteria in chronic inflammatory disease[J]. *Immunology*, 2017, 151(4): 363–374.
- [20] 陶鑫, 薛中峰, 覃骊兰. 基于网络药理学的过敏煎治疗过敏性哮喘分子机制研究[J]. 西部中医药, 2022, 35(3): 27–32.
- [21] 段萌萌, 张葆青. 基于网络药理学和分子对接技术探讨过敏煎治疗儿童哮喘的作用机制[J]. 西部中医药, 2024, 37(8): 73–81.

(收稿日期: 2024-07-09 编辑: 罗英姣)

- (上接第4页) 盤:『玄語』所収「混絜気体」論の解明[J]. 旭川医科大学紀要(一般教育), 1999, 20(3): 9–29.
- [17] 李威周. 三浦梅园的一气论及天命观[J]. 日本研究, 1990(3): 70–73.
- [18] 葛强. 朱子学与日本近世儒学的一元论倾向[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20(5): 160–165.
- [19] 邵沁, 宋欣阳. 明清中日医学交流对汉方医流派形成的影响[J]. 医学与哲学, 2019, 40(1): 77–80.
- [20] 谢海金, 李良松. 日本儒医原益轩的养生观[J]. 中医导报, 2022, 28(5): 7–12.
- [21] 张西艳. 《山海经》与日本江户文学[J]. 浙江学刊, 2019(6): 177–182.
- [22] 于博雅. 《山海经》中医药学知识的内容与传播[J]. 中医文献杂志, 2017, 35(6): 1–5.
- [23] 吉川澄美. 本居宣長の在京医学修業[J]. 日本医史学雑誌, 2016, 62(4): 449–453.
- [24] 本居宣长. 本居宣长全集: 第十九卷[M]. 東京: 筑摩書房, 1974: 817.
- [25] 李时珍. 本草纲目: 点校本[M]. 2版.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4: 2512–2513.
- [26] 福田安典. 医学書のなかの「文学」[M]. 東京: 笠間書院, 2016: 245–264.

(收稿日期: 2024-03-05 编辑: 李海洋)